

经济学博士文选



转型中的 结构变迁与 经济增长

■ 范从来 / 沈坤荣 / 郑江淮 等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转型中的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

——经济学博士文选

范从来 沈坤荣 郑江淮 等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吕 萍 段小青

责任校对:杨晓莹

版式设计:代小卫

技术编辑:王世伟

转型中的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

——经济学博士文选

范从来 沈坤荣 郑江淮 等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100036

总编室电话:88191217 发行部电话:88191540

网址:www.esp.com.cn

电子邮件:esp@esp.com.cn

天宇星印刷厂印刷

河北三河海跃装订厂装订

880×1230 32 开 13.125 印张 350000 字

2005 年 4 月第一版 2005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2000 册

ISBN 7-5058-4527-6/F·3799 定价:20.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本书收录了一批经济学博士对中国经济转型和增长的研究成果。我们这批作者绝大部分是洪银兴教授指导的博士生和博士后，少数是他曾经指导的硕士生。洪银兴老师从1993年获得博士生导师资格后，一直将博士生导师指导方向定位在经济转型和发展。1998年之前，他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指导博士生，1998年后，开始在南京大学指导博士生。迄今为止，洪教授一共指导了38位博士和博士生。2000年南京大学设立了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之后，他又指导了5位博士后。2003年，我们学生策划一本论文集，收录我们博士生论文或研究成果的精华，一来纪念洪教授指导博士生10周年，二来反映一下洪教授带领的学术团队对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的探索，以勉励我们自己和后来者再接再厉，不断地提高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经验总结的理论高度，为转型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理论大厦添砖加瓦。

作为前言，我们更愿意介绍一下洪银兴教授的研究生涯和学术成就。首先介绍的是，1998年，克林顿总统访问中国时与江泽民主席确定了一个重要的合作项目，即中美富布莱特（Fulbright）杰出学者项目。中美双方选定环境保护、经济政策、国内政治、高等教育、文化五个学科，每个学科双方各派一个顶尖学者到对方国家作讲座访问。这是中美之间最高层次学者交流活动。洪银兴教授被选为中方经济学科方面的惟一代表，于2000年9月出访美国，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杜克大学、耶鲁大学、霍布金斯大学等著名大

学就中国的市场化和经济开放作报告，与美国学者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此次洪银兴教授能够作为中国惟一经济学者出访美国进行最高层次的学术交流并取得美国学者广泛认同，不仅在于洪银兴教授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成果斐然，更在于洪银兴教授对中国的经济学学术进展的巨大贡献。2001年他被《中国市场》选为影响中国市场的25位经济学家之一。

洪银兴教授，1950年生于江苏常州市。1976年1月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毕业。1982年10月南京大学经济系研究生毕业，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87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博士研究生毕业，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洪银兴教授在南京大学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到中国人民大学后，师从著名经济学家卫兴华教授，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理论。

灵气加上勤奋足以让一个人攀登上科学的高峰，洪银兴教授在校期间渐渐形成了自己的经济学观点，他在转轨经济方面的造诣日渐深厚，其间发表每一篇文章都凝聚了洪银兴教授独特的思考和对经济运行的深刻把握。当时的中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初步尝试中，西方经济学成熟的理论不能直接指导处于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改革，而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也禁锢了很多人的思维。新的时代呼吁与之相符的理论，这种理论应该实在而不虚浮，突破常规而不偏颇。

正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洪银兴教授在此期间对转轨时期经济运行机制进行了系统的思索和研究。思考主要集中在市场机制的调节功能上。1985年发表于《经济研究》的一篇文章很能反映洪银兴教授这一阶段的思考成果，这就是《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调节机制》。这篇文章不但从微观层面探讨了增强企业活力，改善国有企业激励机制的深层问题，而且从宏观层面研究了将市场调节引入当时计划经济的可行性。从文章风格来看，实证分析的特点给人深刻的印象。洪银兴教授对待经济学的科学态度以及对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严谨态度在文章中开始崭露出来。这篇文章获得了中国

中青年经济改革优秀论文奖。这是洪银兴教授在进入攻读博士学位前写成的论文。

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博士期间，洪银兴教授继续从硕士阶段就开始对经济运行和经济运行机制的研究，他与导师卫兴华教授和同学魏杰合作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是当时国内第一本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专著，其修订版于1990年获中国图书奖一等奖。在攻读博士学位的三年中洪银兴教授先后在国内最负盛名的期刊如《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中国工业经济研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上发表了数十篇文章（含合著），其中与导师合作的《论企业活力和企业行为约束》一文获得了1986年度国内经济学最高奖——孙冶方经济学奖金，另外一篇同样出色的《企业行为和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动力机制》一文也于1987年获得了中国企业改革和发展优秀论文金三角奖。他的博士论文《经济运行的均衡与非均衡分析》是在经济学界享有盛誉的上海三联书店经济学文库的第一本著作，后来先后获得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教育部优秀人文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十年以后洪银兴教授的第一本论文集取名为《转轨阶段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看得出这是洪教授对于自己博士期间辛勤工作的肯定。

带着丰硕的研究成果和对经济学的热情，洪银兴教授回到了南京大学。南京大学进一步给他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他在这里继续进行艰苦的科学研究，同时也投身于经济学科的建设。1988年底他由讲师破格晋升为正教授。1988年12月他的论文《经济运行机制的转换：有序和无序》获中宣部、中国社科院和中央党校联合召开的中央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10周年理论研讨会优秀论文一等奖。接着他又获教育部霍英东高校青年教师奖一等奖。后来又先后于1991年、1994年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委颁发的“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和“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在相当一段时间中，洪银兴有获奖专业户的美誉。洪银兴教授不但在学术上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研究体系，而且

于1993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审获得博士研究生导师资格，开始了洪银兴教授十年的博导生涯。

对学术前沿的关注和对现实经济的敏锐把握，将洪银兴教授的研究重点逐步引入到发展经济学，这是中国学者对中国发展前途的关注与思考。他先后出版了四本发展经济学论著，如1989年的《发展经济学通论》、1994年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发展》、2000年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2001年的《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由此形成了洪银兴的研究特色。其中两本分别获得教育部优秀人文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和三等奖。对国外发展经济学文献的悉心研究，对中国特殊的转轨经济的进一步思考，是洪银兴教授在南京大学科学研究的主线。其间洪银兴教授所主持的国家级课题，如社会主义国家通货膨胀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资金积累和集中，既是当时中国经济中出现的最棘手的问题，又是理论上最需要结合中国实际的部分。主持如此重大课题时的认真思考和细致调研为洪银兴教授在理论上的进一步突破提供了难得的契机。洪银兴教授带领着博士生在转轨经济运行机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上攀上了新的高峰，在原载于《我的经济观——当代百名经济学家自述》中的《非均衡经济运行和发展的有序结构》一文中，洪银兴教授系统阐述了经济的非均衡性，突出了今后对于中国经济问题的思考：如何建立经济的有序结构。在洪银兴教授看来，中国经济改革任重道远，其间经济的非均衡性突出地反映了经济改革的困难，而对建立经济秩序的思考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规范的西方经济学中没有答案，马克思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中也没有答案，洪银兴教授正是在这条道路上，用自己的探索结出了丰硕的果实，迎来人生第二个黄金时期。收录于洪银兴教授的第二本论文集《转轨阶段改革和发展的秩序》中的很大一部分论文就是出于这一阶段，涵盖了经济转轨、经济发展、经济改革、区域经济、基本理论五个方面。大部分论文公开发表在国内各大著名期刊杂志，或最初出现于各种高层论坛。综观这些凝聚了洪教授心血的论文，文风淳

朴浑厚，正如其人。

在发展经济学、转轨经济学、区域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反映了洪银兴教授在经济学方面的成就。洪教授意识到中国经济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全面转变，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经济背景下的理论特征，从而为我国经济转型提出及时的政策建议，洪教授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为出发点，科学地界定了集约型增长方式的基本内涵，认为决定经济增长的物质因素、人力因素已经弱化，技术、知识、人力资本等因素的作用得到强化。在辨明规模经济、技术进步与集约型增长方式的关系后，洪银兴教授指出了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要性，进一步分析了转变过程将会出现的各种矛盾，这些研究成果构成了洪银兴教授在中国经济增长和区域经济方面独到的理论结构。

洪银兴教授分别给硕士生和博士生开设了《经济运行理论》和《资本论》两门课程，听者云集。洪银兴教授对经济学经典理论的掌握和对经济前沿问题的关注让所有学生受益无穷，博士期间的博览群书让洪银兴教授在讲台上旁征博引，出国访问的亲身体会融于课堂。可以说，经济学上的图形公式在经济运行理论中得到深入浅出的体现。该课程除了系统介绍了成熟市场经济的运行理论及其福利含义，最大的特色就是将自己数十年对中国转轨期间特殊的经济运行方式介绍给下一代的学生，让学生们在学习的同时体会到将经济学理论融入现实经济问题思考的方式。每节课后是半小时的提问时间，在这里，洪银兴教授回答同学们关注的各类问题，从容作答，颇具大师风采。他主持的经济系课程改革曾经获得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他主编的《现代经济学》教材获得2002年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洪银兴教授现任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在资本论理论上面的功夫不用多说，对资本论本身更是有独到和客观的见解。在西方经济学浪潮涌向中国学术界的时候，很多人特别是青年人对资本论渐渐产生误解，认为那是和市场经济格格不入的东西。很多

博士生直到上了洪银兴教授的《资本论》后才彻底改变了看法。资本论中马克思研究经济问题的逻辑方法被洪老师放于第一位，用资本论的研究方法深刻认识经济问题也被置于对文字只言片语的狭隘解释之上。《由批判转向建设——论资本论研究思路的转变》一文是洪银兴教授对新时期资本论研究方法和研究态度的系统阐述，洪银兴教授认为，马克思所写资本论时期的经济背景与今天已远远不同，简单套用资本论的结论将会对我国的经济建设造成负面影响。而与此同时，马克思对经济问题的抽象以及采取的研究方法却并没有过时，如何借用马克思这些精髓对中国现实问题进行分析，对中国经济转轨提出切实建议，才是对待资本论的最好方式。由于洪银兴教授对资本论采取的这种开放式态度，资本论的课堂气氛轻松，讨论热烈。

洪银兴教授除了通过承担的重大级国家课题在理论高度上给国家的宏观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建议，还用自己的学识和见解为江苏的发展提供了高屋建瓴的政策建议。洪老师曾经说过，一个经济学家一旦具备了扎实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对于形形色色的经济问题便能够自然地提出合理的见解和建议。洪银兴教授作为“江苏发展高层论坛”的主任，通过沟通南京大学等高校的经济学家和政府高层官员之间的关系，为社会科学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做出了杰出贡献。洪银兴教授自己对江苏经济的思考成果也被收录在第二本论文集《转轨阶段改革和发展的秩序》中。理论框架中融合了大量经济政策的丰富实践，使洪老师的理论和政策主张一起，显得更加生动和具有说服力。

如今洪银兴教授回到南京大学经济系已经有15年，在这15年中，经济系已经成长为一个高手云集的经济学殿堂。尤其是政治经济学，作为国家重点学科，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前来学习。洪银兴教授在自己十年的博导生涯中，用自己的言传身教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博士生。从他们取得的成就中可以体会到洪银兴教授作为老师、作为博士生导师对待弟子的一片苦心，如今他们或者进入研

究所、高校或者进入企业，开创他们新的事业。博士生活的紧张忙碌永远是他们生命中的一笔财富，而洪银兴教授的教诲和指导则让他们永远难忘。在洪银兴教授博导十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我们将自己的得意之作呈现出来，汇成一册。既是对自己博士生活的回顾，更是一份给洪老师的特别献礼。绝大部分文章已经在各大期刊公开发表，或者已经体现于政府的经济决策，或者在理论上做出贡献。回首洪银兴教授自己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博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近 20 年，如今自己的博士生已经桃李满园，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已经开始崭露头角。希望这本论文集能反映他们对经济理论的思考、对经济问题的思考，不负洪老师所望。

序 言

洪银兴

我国从 1978 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经济改革标志着经济转型的起步。经济转型涉及三个方面：一是经济体制的转型，即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是增长方式的转型，即由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向集约型增长方式；三是社会转型，即由不发达经济转向现代化经济。20 多年的经济转型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也带来了多个层面的变化：市场态势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宏观经济不均衡的主要特征由通货膨胀转向通货紧缩；经济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动。与此同时，转型中的摩擦和矛盾正在显现，市场秩序的混乱，信用的缺失，失业和下岗的剧增，收入差距的扩大等等无序现象又成为经济转型的阻力。这表明潜伏的体制矛盾还在逐渐显示。因此，实事求是地研究已经和正在进行的转型的无序现象，从中寻求由无序走向有序的路径，应该是十分有意义的。根据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与时俱进的品格，经济转型需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针对前一阶段转型中的摩擦和矛盾，新时期的经济转型进入新的阶段。

一、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导向的社会转型

由不发达转向现代化，可以说是在社会形态方面的经济转型。在制定现代化建设的蓝图时，邓小平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构想：第一步从 1981 年到 1990 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

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 1991 年到 20 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 21 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十六大根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了在本世纪头 20 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其意义在于，在完成第二步战略目标后到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阶段之间加了一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使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有个明确的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包含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将小康社会建设作为现代化的具体阶段来推进，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在趋向现代化的进程中突出全面小康，是要明确，经济增长的每一阶段都要给人民群众带来实惠，使人民群众分享增长的成果。其实质是富裕人民。可以说，能否富民，人民的富裕程度达到什么水平是经济转型是否成功的试金石。这体现人民的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的结合。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固然需要关注 GDP 指标，特别是人均 GDP 指标。例如根据十六大描绘的蓝图，2020 年人均 GDP 将达到 3000 美元，这是全面小康社会的数量指标。许多小康社会指标依赖于人均 GDP 的增长。从现代化的进程考察，人均 GDP 是重要指标。人均 800 美元与 4000 美元不仅仅是数量差别，在许多方面还存在着质的差别。原因是全面小康社会的某些关键性特征需要人均 GDP 达到一定的水准。例如根据发达国家所走过的历程，收入差距的缩小要在 GDP 达到 1500 美元以后才开始。再如人们服务性消费的扩大，高等教育的大众化，环境的治理和改善等等，都需要在人均 GDP 过了 1000 美元后才逐步推进。原因是这些方面的供给和需求不能脱离用人均 GDP 指标衡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因此达到全面小康，根本的是经济发展，实现 GDP 等数量指标的翻番。

但是，不能把 GDP 指标强调过头。用 GDP 指标衡量经济增长和小康水准时存在着功能性缺陷：第一，它不能反映人民群众对多

方面需要的满足程度，现实中人民需要满足程度（包括人民群众的消费水平）同 GDP 增长并不是同步的；第二，它不能反映为取得这些成果会付出的代价，包括人力、物力及各种各样“牺牲”的代价，特别是环境质量的下降；第三，它不能反映增长成果的分配，哪些人在增长中得到更大的利益和共同富裕的程度，例如收入差距的扩大。这些恰恰是我们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要解决的问题。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突出生活质量的提高。生活质量指标包含多方面内容：其中包括人民生活的改善、受教育机会增多和其他社会福利的普及和提高。目前，人民群众的消费水平仍然存在着结构性缺口。最为突出的是，居民收入水平、恩格尔系数、人均住房面积、居民小汽车拥有量、受教育程度特别是接受高等教育的程度、环境质量指标以及服务消费水平均还处于低收入国家水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及富民政策就一定意义上说，是要针对这些结构性缺口进行重点建设。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只是指物质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还要求在精神生活方面达到小康，就是说富民不仅要在物质上富有，还要求在精神上富有，其中包括享受政治上的民主，现代文化和教育方面的熏陶。显然，全面小康所要求的 GDP 指标可以提前达到，生活质量的指标，环境质量的指标，精神文明的指标，政治文明的指标，法制完备的指标等不可能像 GDP 指标那样那么快就能实现。

富裕人民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要保护发达地区、优势产业和通过辛勤劳动与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人们的发展活力，鼓励他们积极创造社会财富，与此同时，高度重视和关心欠发达地区以及比较困难的行业和群众，特别要使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并积极帮助他们解决就业问题和改善他们的生活，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这两个方面的兼顾，特别是强调“更要”关心低收入群体，体现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实践中两者的兼顾既要靠市场又要靠政府，前者在初

次分配中起作用，实现效率目标；后者在再分配领域起作用，实现公平目标。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是富民的直接体现。因为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扩大是建立在低收入群体减少的基础上的。不仅如此，从一定程度上讲这是解决小康社会建设的拉动力。在发达国家中等收入者阶层被称为中产阶级。他们由公务员、律师、医生、企业主、教授等组成。在现代社会中，中等收入者是社会的中坚阶层，也是社会中最稳定的阶层。全社会收入的提高也是由中等收入者阶层的扩大带动的。更多的低收入者进入中等收入阶层，意味着中等收入者是改革和发展的直接受益者，更是改革与发展的推动者。据有关资料，我国目前的中等收入者标准为人均年收入超过 5 万 ~ 8 万元，达到此标准的据统计不到就业人口的 15% 左右。从发展趋势讲，如果将就业人口分为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三个阶层，这个结构不应该是金字塔型的，原因是低收入群体过大的社会不仅是落后的，也是不稳定的。显然，全面小康社会的居民收入结构应该是菱形的，或者是橄榄型的，即处于上端和下端的高收入者比重和处于下端的低收入者比重都是较低的，处于中端的中等收入者比重应该是较高的。中等收入者比重的不断提高将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现实进程。

兼顾公平的基本考虑是提高低收入者收入，从而缩小收入差距。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收入差距扩大是现代化的代价。结构调整会使弱势产业部门的就业者地位下降、甚至下岗失业。现在，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不仅发生在不同地区间，也发生在不同阶层间。根据库兹涅茨的倒 U 形曲线，在推进现代化的起始阶段，收入差距有扩大的趋势，而到一定阶段收入差距便开始缩小，他把收入差距开始缩小的那个“拐点”看作是进入现代化阶段。衡量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在我国现在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问题是，我国这种程度的收入不平等是建立在人均 GDP 处于低水准基础上的。这意味着，最低收入组的收入不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不

可避免的会产生车匪路霸之类的社会冲突，从而成为小康社会建设和现代化的障碍。现在突出小康，意味着收入差距扩大的状况不能等到实现现代化后再去解决，必须在小康社会建设过程中去解决。基本要求是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目前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就集中在提高两大低收入群体即农民和失业下岗的职工的收入水平。

提高农民收入与解决整个“三农”问题相关。其主要途径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具体地说，解决农民问题靠减少农民，解决农业问题靠非农化，解决农村问题靠城市化。这就是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为此需要消除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障碍，建立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市场。在此基础上，通过加快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农业的外向化进程等途径提高农民收入。

提高失业和下岗职工的收入的关键是扩大就业和促进再就业，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无论是解决就业问题还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都应该与经济转型相一致。就业是民生之本，解决就业问题的关键是改善创业环境和增加就业岗位，健全就业再就业服务体系。提供更多的就业和再就业固然是政府应尽的责任，但更为有效的途径是劳动者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政府在这里所要做的是为之提供有效的政策和环境，提供有效的服务。

二、以基本经济制度为导向的经济体制转型

全面小康社会建设需要制度保障，最根本的是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

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已经推进了 20 多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新事物新矛盾层出不穷，也面临着大量前所未有的新课题。就目前来看，阻碍发展的制度供给缺口主要涉及以

下内容：一是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制度；二是鼓励创新和创业的分配制度；三是鼓励企业家成长的社会氛围和制度；四是鼓励科技进步的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度；五是维持市场秩序和信用的市场规则和信用制度。针对这些新问题、新课题需要在理论创新的基础上进行制度创新。

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体制转型的基本要求是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要求，改革和调整生产关系，根据改革中形成的新的经济基础的要求改革上层建筑。其目标是解放和发展推动社会前进的先进社会生产力，并且为先进社会生产力发挥作用提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的制度安排。制度创新从根本上涉及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创新。

我国经济理论工作者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对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探索，对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探索，等等，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也是新时期经济体制转型的根本指导思想。其意义在于通过市场经济、多种所有制经济和多种分配方式等方面的制度安排解放和发展当前最为活跃的生产力。

这里特别要关注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概念提出的客观背景。前一阶段的市场化基本上是在制度外发展非国有经济。由于当时中国的市场属于卖方市场，商品严重短缺，非国有经济进入的行业基本上带有“填空”的特征，其发展迅速是显然的。进入 90 年代后期，一方面，制度外的资源被充分动员，这就使非国有经济发展遇到资源限制；另一方面，许多领域特别是非国有经济成分主要进入的制造业领域进入了买方市场，这些领域的竞争过度造成非国有经济成分发展的势头减缓，效益下降。在这种市场新格局中，产生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的激烈竞争，其结果是国有企业效益下降和非国有企业发展受阻。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的资产结构重组便是这种背景下的必然选择。

根据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明确为基本经济制度。这意味着公有制与各种非公有制经济都是基本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它们不是对立而是合作的关系，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根据发展先进社会生产力的要求，需要突出“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关于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具有重大的推动新的思想解放的意义。其现实性在于为当前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各类企业的改革清除了思想障碍。

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要求。实现公有制为主体的关键是明确公有制及公有制为主体的含义。公有制经济不是指公有制企业，而是指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公有制为主体不是指公有制企业为主体，而是指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

根据我们对基本经济制度的界定，可以明确所有制结构进一步调整的方向。首先，公有制为主体界定为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那么在不涉及国民经济命脉的部门国有经济就没有占支配地位的要求，于是就出现国有经济在非国民经济命脉部门中退出低效益企业、长线产业的战略性调整。其次，公有制为主体体现在企业股权结构中的控股地位和控制力，那么在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国民经济命脉部门中也不一定要国有全资，除了极少数部门必须由国有独资以外，大部分可以采取股份制形式，在保持国有资本控股的前提下让出一部分股权给非国有资本。第三，公有制为主体是资本概念而不是企业概念，公有制企业的减少，比重下降不影响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在非国有资本积极进入的竞争过度的行业，国家可以主动地拍卖和出售国有企业（包括效益较好的企业），让非国有的资本进入这些企业。这个过程对企业来说是其资本的置换，对国有资本来说是资本由存量变为流量，由实物形式变为货币形式，是国有资本的物质承担者的改变，由此可能产生国有资本由低效益占用向高